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近年來，中外學界對於冷戰史研究重新燃起興趣，尤其有關「文化冷戰」的討論可謂方興未艾。敝刊將於10月號刊出幾篇新近的學術成果，除了希望鼓勵更多學者加入研究行列之外，更期望營造一個交流平台，進一步孕育研究氛圍。

——編者

不必也不宜曖昧

讀畢伍國〈胡適的徘徊與曖昧——兼評黃克武《胡適的頓挫》〉（《二十一世紀》2022年6月號）一文，感到作者對胡適其人其思的評述，毫無徘徊與曖昧之感，可謂異常的堅決與明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篇以書評形式導入的、帶有明確解構與評判意向的文章，實在是不必配以「胡適的徘徊與曖昧」這樣的標題，不妨就徑直以「胡適的歷史局限性」為題，直截了當地陳述己見。

筆者以為，任何歷史人物的思想言行都受限於歷史本身。不難發現，因歷史局限性本身所帶來與引起的，後世研究者對歷史人物在理解、認知、解讀等各個層面上的多元性與差異性，乃至矛盾性（既普遍存在於不同研究者之間，

也經常存在於同一研究者不同階段甚至同一階段的觀點之中），恰恰也正是歷史研究工作得以確立、存在與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

不過，如何理解、認知與解讀歷史人物的局限性是一回事；這一局限性的來源與形成，諸如當時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乃至個人品性氣質、情感世界、家庭生活等方面之探究，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這一探究基礎之上，最終達成對某一歷史人物之局限性的評判，此人的思想言行在同時代處於怎樣的水平與境界，等等，則又關乎學術及道德評判。

本文之中，對於胡適的歷史局限性，作者頻發斷言，屢有定論，並不曖昧。事實上，作者並沒有特意去推演與解析這一局限性本身的曖昧何在，而是特別着力於非同一時代學人的學術水平之評判，乃至帶有「終審」性質的、宏觀意義上的道德評判。譬如，文章有這樣的確切判定：「殷海光遠比……胡適，更像一位思維嚴密、對現代社會科學諸門類極為了然的社會科學家。……殷海光的思想本身已經超越了胡適。」再如，關於胡適的人格類型，文末還有「蓋棺論定」式

的宣告：「在二十世紀中國，一個完全正直的知識人不可能同時擁有地位、金錢和『獨立』的清譽……」

作者既然有如此堅決的斷言，在此，筆者不妨也拋出幾個疑問：為甚麼殷海光「更像」一位社會科學家？殷海光的思想本身已經超越了胡適，這一判定又是如何考證乃至認證出來的？「一個完全正直的知識人」，這裏的「完全」與「正直」兩大界定，是從甚麼意義上來斷定的？筆者以為，這些關乎學術水平與道德操守的評判，作者都應當予以充分求證與確切解釋，不必也不宜曖昧。

肖伊緋 成都

2022.6.15

本地化和國家化的協奏

據筆者所知，打從新世紀以來，國內以《聖教雜誌》為中心展開討論的碩博士論文已不下五篇，關注的重點有天主教文學形態、徐宗澤生平著述及其思想、中國天主教發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上海天主教學校教育和中國天主教知識人的國家觀，等等。王鵬璋的〈天主教在「主義時代」的調適——以徐宗澤解讀三民主義為例〉（《二十一世紀》2022年6月號）一文亦是其碩士論文的延伸內容。可見，學界對《聖教雜誌》這座「礦藏」的挖掘逐步深入和細化。

與之前的研究成果比較，該論文同樣以「政教關係」為依歸，但視角新穎，且具條分縷析之功。論文緊扣天主教和三

民主主義關係這一主題，將其置於北伐戰爭興起、國共合作走向分裂、南京國民政府初立這一從暴力革命過渡到秩序重建的特殊歷史時期，以徐宗澤及《聖教雜誌》對三民主義的早期認知，徐宗澤秉承旨意撰寫〈三民主義之分析〉來調和兩種意識形態、以求得最大公約數，以及教育部對〈三民主義之分析〉進行審查與修改並形成符合政治要求的《三民主義節要》為主線，揭示出天主教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合法性並接納三民主義背後的複雜性。

儘管天主教對三民主義、黨化教育存有異議，但不難看出它對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妥協。同時，天主教拒斥中共及其「社會主義」，不僅出於意識形態或道德觀的原因，而且有其深刻的現實根源——後者的成功恰恰建立在摧毀前者賴以發展壯大的傳統宗族制度和土地制度之上。因此，「反共」成為天主教和國民黨的重要共識，拉近彼此距離。也是在這一時期，中梵兩國政府試圖在外交上取得突破，教會內部中國主教和神父人數有所增加——這一切都可視為天主教為適應「主義時代」，邁向本地化的具體步驟，最終目的是維護其在華根本利益。一定程度上而言，天主教的本地化是國民黨確立黨國體制之協奏。

需要指出的是，論文的個別表述有失嚴謹。比如徐宗澤字潤農，而非潤龍；徐匯公學又稱依納爵公學，不是兩所不同的中學；蘇俄的主要宗教是東正教；差會、教派是新教的叫法，天主教稱修會。作者非

研究教會史出身，此類瑕疵，其實請熟悉中國天主教會史的同仁審校即可彌補。當然，瑕不掩瑜。

陳鈴 杭州
2022.6.18

中國近代喪葬史的完整圖景

就中國近代史上死亡文化的變遷問題，近些年湧現出一些高水平的著作。前有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的《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後有武玲的《逝者治理：近代中國的英烈、紀念物與亡故公民》(*Governing the Dead: Martyrs, Memorials, and Necro-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從更宏觀的層面考察民國死亡問題。武玲認為，民國政府通過舉行公共追悼會、修建忠烈祠等手段，使得烈士的喪葬禮儀高度政治化，將對烈士的追思引向民族國家構建和黨國體制的強化；民國喪葬政治中對「為國而死得其所」的讚頌和對暴力的正常化，與1949年後的社會動員機制和喪葬儀軌存在一定的繼承參考關係。以此觀之，該書或可為馬金生〈追悼會在當代中國——一項喪葬儀式的歷史浮沉〉(《二十一世紀》2022年6月號)一文之前史，兩者互參，庶幾幫助我們獲得中國近代史死亡問題的一個更完整的圖景。

文章首先追溯中共建國前的追悼會，並指出國共兩黨追悼會的根本不同。儘管兩者都是社會動員的手段，但國民政府重在以追悼喚起國家想像，

而中共追悼會主題的主體則鮮明體現了革命意識形態和階級觀念的構建。兩種不同的追悼會形式也在此一時期形成，即由政府組織者和群眾自發組織。建國後，追悼會逐漸制度化，成為國家儀軌，並開始帶有鮮明的官位等級色彩，其主體更與社會主義建設掛鉤。作者細緻分析了追悼會由城市向農村滲透的趨勢；這一趨勢似在1980年後遲滯，追悼會開始在當代社會式微。

如果說，追悼會推廣體現了以國家改變社會的思路，那麼另一端，社會也並非一塊被任意形塑的膠泥；面對國家干預，或自有其內在的韌性與抵抗、協商與變異。作者對此多有着墨，兩不偏廢：原有社會單位的解體，社會結構的原子化、碎片化，追悼會制度自身浮於形式和帶有濃厚的等級色彩等原因，都使得一般民眾和追悼會漸行漸遠，漸漸失去了社會動員的功能。

不但中華民族尊崇慎終追遠，在世界範圍內，悼亡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議題。作者盡可能參考了現存的人類學研究成果，但篇幅所限，一些議題無法展開。例如，中共提倡追悼會是否與其時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追悼會制度有關？再者，有關民眾與政治化追悼會的漸行漸遠，除開作者分析原因，其中恐怕也和改革開放後一些牽動時局的政治變化相關聯。畢竟國家和社會處在持續的張力中，社會動員帶來的後果並不總是能夠管控。作者長期治喪葬史，這些問題想必早有涉獵，更期待其有專書跟進，以饗讀者。

李燦 哥廷根
2022.6.21